

对话

宁波大学副校长邵千钧:

高等教育应进一步提升学生素质

■本报记者 温才妃

长期以来,中国高等教育过度重视专业教育,导致理工科学生对人文社科知识了解过少,文科学生对科技发展所知不多,使得大学生毕业时能力单一、创新能力不足、欠缺独立性。在宁波大学副校长邵千钧看来,产生上述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本科人才培养质量不高,对通识教育重视不够。“高等教育应该进一步关注大学生的素质提升,增强通识教育、创新创业教育。”

高等教育满意度呈现“两重天”

《中国科学报》:您如何评价我国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

邵千钧: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呈现了两种不同的面貌,一方面是老百姓对高等教育质量颇多微词,对大学生的素质与人才培养质量并不满意;另一方面是中国高校在全球大学排行榜上一路高歌猛进,多所高校已经进入到了全球200强甚至100强,超越了许多传统欧美名校。中国高校在排行榜上的提升主要得益于学术水平的快速提高,这对高校来说是件大喜事,本身无可厚非。但如此矛盾的局面,背后却暴露出高校人才培养上的短板,其根本原因在于人才培养质量不高。

《中国科学报》:在您看来,造成本科生培养质量不高的原因何在?

邵千钧:从高校管理者的角度来看,造成本科生培养质量不高主要原因有三:一是高校管理过分强调学术导向。或者说,高校管理者更关注科研与显性指标,而对本科人才培养质量这种隐性指标的重视程度不够。二是高校扩招后,教师数量跟不上学生数量增长,生师比偏高,教师教学与科研的任务重,在教学上的投入偏少,课堂教学质量不高。同时,课堂中的学生规模大,大课多、小课少,学生个体受到的关注度不够。三是高校对学生的考评机制未实现根本性的转变,考核制度不够严格,尚未实现宽进严出的人才选拔机制与培养机制,导致部分质量未过关的学生流向社会就业。

高校应重视素质培养

《中国科学报》:改变本科生培养质量不高的突破口是什么?

记者快评

行政部门不应成为转专业的障碍

温才妃

转专业是时下国内高校通行的做法,甚至一些高校以零门槛转专业吸引优质生源进入。然而近日,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多名转专业学生,在就读两年后被要求转回原注册专业就读。起因在于,省教育厅通知称不允许这些学生转专业,学校称此前不知有此政策。

媒体在采访中得到省教育厅负责人的答复——五年制专科指的是先后读三年中专和两年大专,这种学制下“转专业是不允许的”;对于有学生在入学时从英语专业转为会计专业,这“本身是不符合规定的”。

很多人看来,学校没有遵循教育厅的规定,不知有相关限制政策,过失方在学校。但仔细想来,省教育厅凭什么要禁止学生跨大类转专业?这一项已在不少高校内部打通的机制,并不是一句高高在上的“不允许”“不符合规定”就足以解释清楚的。

长期以来,转专业牵扯更多的是学校与考生的利益。学校要承担学生过度流向热门专业,导致冷门专业开办不下去的风险,以及社会上关于低分考生流向高分专业带来的公平性争议。而考生则要为自己的二次甚至三次选专业,承担选择上的风险。自始至终,学校要为自己的专业设置乃至学校的生存负责,考生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行政部门并不是利益的直接获得者,但却成为最大的干扰者,显然是说不通的。

这背后实际上涉及的是一个老话题——高校自主权的获得与应用。即便是在转专业越来越开明的当下,还不时爆出学生因专业不合适选择退学,重新参加高考的新闻。不得不承认,其中的一大原因在于,高校没有合理地运用自身的自主权,制定灵活的转专业政策;行政部门对转专业的限制过死,造成学生“想转无门”。

在笔者看来,就转专业一事而言,行政部门应该转变角色,由政策制定者转向事后管理者,进一步精简政策障碍,放开备案的范围,真正把转专业的权力下放给高校,让高校根据自身情况设定合理的转专业条件,学校、考生自负风险,如此方能更好地兼顾双方的利益。

邵千钧:据浙江省有关部门对毕业生的调查,省内高校毕业生就业一年后的专业相关度只有60%左右。可以看出,相当部分的学生在非本专业就业,而且有进一步加大的趋势。根据这一形势变化,高校理应将通识教育提到更为重要的高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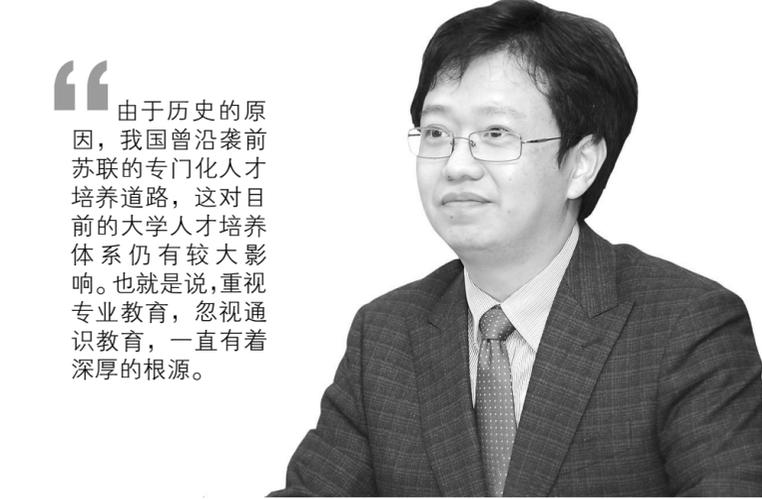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曾沿袭前苏联的专门化人才培养道路,这对目前的大学人才培养体系仍有较大影响。也就是说,重视专业教育,忽视通识教育,一直有着深厚的根源。当然,我们今天所讲的素质培养,是指既要重视专业素养,又要重视通识教育。

以工程专业为例,美国的工程专业认证要求学生需要掌握的基本能力有十一项,这基本上代表了一个工科学生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从专业素养上看,我国高校培养的学生主要在三个方面存在不足:一是工程领域的知识跨度不够,专业知识面过窄,难以应对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二是实践与理论不匹配,实践动手能力偏弱,团队协作能力不强;三是创新能力不足,设计新产品、解决新问题的能力不够。

通识教育目前还存在诸多问题,主要是课程跨度与深度不够,学生还难以适应未来变化。人类面临着能源供应不足、生态环境恶化等诸多方面的困境,除数学、科学、工程等基础知识以外,学生还应该掌握经济、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社会、政治、健康、安全等多方面知识。本人所在的学校对全体学生的通识教育提出了五大目标:科学素养、人文情怀、广博视野、沟通表达、批判思维等。同时,我们还应该更加重视对学生进行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普及与传承。

《中国科学报》:作为迈向现代大学制度的中国高校群体,如何去重视并提升大学生素质呢?

邵千钧:个人觉得可以从四个方面着手:一是从管理角度,着力构架好人才培养质量的考核体系,主要体现在教师考核、经费预算、业绩评定等多方面重视对教学工作的投入;二是参照人才发展与社会需求,设计好人才培养体系,将通识与专业、理论与实践、必修与选修等不同课程类型进行合理设计;三是关注课堂教学质量,让每堂理论课与实践课均能发挥出有效作用;四是树立正确的人才观与质量观,注重优秀品质与综合素养的引导,严格每门课程考核,使通识教育与专业素养均达到人人过关。



教师评价应重荣誉感和学术尊严

熊丙奇

教育部近日下发《关于深化高校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下文简称《意见》),《意见》指出,要扭转将科研项目与经费数量过分指标化、目标化的倾向,改变在教师职称(职务)评聘、收入分配中过度依赖和不合理使用论文、专利、项目和经费等方面的量化评价指标的做法。探索建立“代表性成果”评价机制。扭转重数量轻质量的科研评价倾向,鼓励潜心研究、长期积累,遏制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

对高校教师实行量化考核、评价,导致教师围着论文、项目、经费转的现象,表面上看,高校由此取得“丰硕”成果,但真正有原创价值的学术研究成果其实寥寥。同时,重科研轻学术,严重影响高校的人才培养。可以说,高校教师考核评价制度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此次《意见》直面当前高校教师考核评价存在的问题。《意见》所提方案也颇具针对性。但要让这些改革方案落地,还必须解决两大根本性问题。

其一,要调整对高校办学的总体评价,淡化行政评价,进行专业评价和社会评价。我国高校为何重视对教师的学术评价,忽视教学评价;在学术评价中,又强调发表论文数、申请专利数、申请课题经费;同时很多高校倾向于短期评价?一个重要原因是,上级行政部门是用这些指标考核学校。校长如果在任期中能大幅提高这些指标,就将是学校办学的重要政绩。因此,学校就将这些指标下达给各院系、教师,并建立任务与资源挂钩的管理方式。这种办学政绩导向使高校对教师的管理、考核、评价走向简单化、粗放化,即便后来开始重视“质量”,也还是在数量考核上做文章。

如果这种评价制度不变,高校办学就很难摆脱传统政绩思维。而且在行政评价的影响下,社会也会以功利的视角评价高校的“进步”。只有让行政评价退出,积极培育专业评价,推进社会评价,才能扭转用单一评价体系进行评价的局面。2010年颁布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到,要推进专业评价。鼓励专门机构和社会中介机构对高等学校学科、专业、课程等水平 and 质量进行评估。建立科学、规范的评估制度。探索与国际高水平教育评价机构合作,形成中国特色学校评价模式。这是推进我国高校教师考核评价制度必须配套的基础性改革。

其二,要对教师实行专业同行评价,而不能再由学校行政职能部门订评价指标、实施评价。这次《意见》也提到了完善同行专家评价机制,但仅一笔带过,同时也提到教师专业化发展,但具体要求是“增设教师专业发展考评指标,根据学校实际情况细化对教师专业发展的具体要求”。而完善教师专业评价机制必须在高校建立独立的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由它们负责高校的教育事务和学术事务管理、决策。否则,《意见》所提的要求也会当作行政任务来执行,而在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的管理与评价中,这是用不着提多少行政要求的,只要坚持教育标准和学术标准,它们就会关注教师的教育能力、学术能力、教育贡献和学术贡献。

高校教师要实行专业化、职业化发展,不是根据教师所在不同专业,提出不同评价要求,而是要通过高校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来实现高校朝教育与学术本位的回归——教师在自己的岗位上,有教育自主权,从事学术研究,有自由探索的空间,并通过教师同行评价,增强教师的教育与学术荣誉感,并以这种荣誉感,提升自我对教学工作与学术研究的要求。世界一流大学就是靠这些来保障教育品质,提高学术水平的。而在我国,行政治校之下,高校教师最缺少的就是教育荣誉感与学术尊严,而离开这些,大学就难有高品质的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这是无法靠强化行政要求和利益激励扭转的。

(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创新创业作为专项能力加以重视

《中国科学报》:时下的创新创业被视为提升大学生素质的重要一环。在您看来,它拓展的是哪些能力、精神?高校应该给予哪些支持?

邵千钧: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创新创业教育被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虽然创新创业教育融于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之中,但也可以作为专项能力加以重视。创新不是凭空瞎想,而是基于良好知识体系与专业素质的一种提升,并提出新产品、新方法、新路径。除此之外,创新精神应关注探索精神和批判性思维的培养。纵观海内外成功的大学生创业者,他们创业的基点主要是创新,而且是与专业结合的创新。所以,我们提倡大学生创业应该有好产品、好的技术、好的服务模式,在市场上应具有一定的领先优势。

创业可能还需要具备一定的知识与能力,包括技术、市场、财税等。所以大学应该提供三个方面的服务来倡导大学生创业:一是提供学生创新的机会,使学生掌握的技术或产品在市场上有一定的先进性;二是提供学生掌握市场、财

税、营销、管理等相关知识的课堂;三是提供学生创业锻炼的机会,包括在校内设立创业园、创业街,让学生参与创业实践,提供融资或创业资金、企业注册等创业一站式服务支持,制定支持创业的学籍管理政策等。

《中国科学报》:高校在重视创新创业教育的同时,应该怎样看待大学生的创业行为?

邵千钧:高校既要重视创新创业教育,也要理性对待大学生创业。有些高校盲目以数量代替业绩,甚至将开设网店作为创业典型。个人认为必须鼓励创业团队重视产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供应链创新,让创新驱动创业,创业实现梦想,而以荒废学业为代价的创业是不足取的。

大学生创业做得好不好,一是看产品或技术的先进性或不可替代性,二是看团队整体能力,三是看市场环节,特别是周边的配套能力、市场活跃度等。所以,高校在创业教育这一环节中,着重做好创新创业教育,以创新作为学生创业的源动力。同时提供创业相关的课程,让学生能够学以致用。同时,学校应提供创业实践的基础条件,包括场所、风险投资、创业导师等。

大学需要开展劳动教育吗

■周双喜

劳动教育在学生教育培养中的地位和作用,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劳动教育体系。学生毕业后,除了一份学习成绩单以外,学校还将为毕业生提供一份劳动教育情况登记表。而用人单位在选用人才时对学生在劳动教育中的表现情况更为看重,他们能从中观察学生是否具备吃苦耐劳、执着坚持、团结协作、诚实守信等品质。

基于此背景,在充分调研台湾地区高校劳动教育实施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学校学生的特点,从2014年10月开始,笔者所在学院在江苏高校中率先“试水”劳动教育。活动实施一年多以来,大多数学生渐渐养成了守时、懂礼貌、忠于职守的良好品行。

参与活动的学生有许多较为深刻的体会:比如,当学生的劳动服务行为受到他人赞扬时,学生能感觉到价值的体现,并对下次活动充满期待;再比如,当学生本人经历过劳动服务过程后,会格外关注自己的劳动成果,并对他人的不良行为习惯性劝诫效应;此外,学生们走出课堂,走到校外,开阔了眼界,锻炼了本领,增强了技能,扩充了知识面。

这充分说明在大学开展多种形式的劳动教育完全有必要,且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具体实施层面,从开展劳动教育活动的过程中,我们深切感受到,在大学生中开展劳动教育,应将“劳心”和“劳力”相结合,既要组织志愿讲解、义务授课等“智力”实践活动,也要有打扫卫生、后勤绿化、照顾孤寡老人等“体力”实践活动;应着力丰富劳动教育的内容,将劳动教育与学生生活技能培训紧密结合,激发学生参与劳动的热情。比如炒菜(西餐制作)培训、种花插花技能培训、缝纫学习等活动,都深受学生的喜爱。

应注重劳动教育的实践基地建设,为活动的长期有效开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如著名文化景点、农民工子弟学校、社区居委会、学校绿化公司、学生食堂等,都可以成为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另外,还可以通过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发动学生自己找项目、自己找阵地,锻炼学生的开拓、协作精神。

在今后劳动教育实践的不断尝试中,我们将继续沿着既定的目标和方向,不断丰富教育活动的内容,努力调动学生参与活动的积极性,调整完善有关的考核评价方案,积极探索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新方法。

(作者系南京理工大学教育实验学院院长)

域外传真

从QS排行榜谈高等教育全球变化趋势

■杰克·莫兰

近日,第十三届QS世界大学排名发布。通常,总会有一些对此很感兴趣的人作排行榜的数据观察,而这种对数据的仔细检视,也的确可以让我们辨别高等教育现有格局和潜在的发展趋势。

也许今年最大的趋势是西欧教育界表现的衰退。法国、葡萄牙、德国和意大利的衰退程度各有不同,但西欧最重要的震动应该还是英国。

举例而言,剑桥大学从第三位下降到第四位就可能代表了一个小的波动,就如同伦敦国王学院跌出前20名一样。另外,在英国进入全球前400位的48所大学中,有38所都出现排名下滑,这种变化虽然小,但值得留意,这意味着英国高等教育体系如今乌云密布。

然而,更具重要性的是参考每位研究人员的论文在全球被引用次数的指标。在这方面,剑桥大学在引用率方面出现下滑,这种不佳表现背后的意义相当重大。同时,英国进入全球前100位的机构数量连续第二年少于中国。西欧相关机构的研究力总体呈静态,但世界其他地方的大学正在快速进步,中国的崛起就是最好的例子。而丹麦、瑞典、比利时和法国的大学无论是声誉还是研究表现,似乎都在遵循着与美国大学不同的发展轨迹。

究竟发生了什么?就英国而言,脱欧是一个充分原因。几乎所有QS排行榜用于今年的排名的数据都是在6月23日之前收集好的,而且许多指标都是跟踪记录了五年的数据。排名表明,这个国家严厉的政策也许正在输掉它的研究人员和学生。

今年增加给英格兰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的2000万英镑,是2010年以来的首次,而且这还不足以弥补2010—2011学年以来的实际削减。再加上这六年来的通货膨胀,很明显,英国政府是在要求自己的大学用更少的资源做更多的事。

在丹麦、瑞典和法国这三个国家中,丹麦和瑞典都与世界紧密相连,它们已经达到了欧盟的研究和发展支出目标,13所大学中的12所的研究表现都取得了进步。法国则在看到本国科研在整体性和研究影响方面双双下降,且遭到学术界的一片声讨之后,才决定违背之前要削减200万英镑教育开支的决定。尽管最后还是相当于削减了期待值的一半。

在美国,大学可以接受大量私人资金的捐赠,美国大学第一次包揽了QS全球前三名的宝座。巴西则在数十年来最严重的衰退中勉力维持它的

高等教育系统,尽管这一系统无论从资金还是从人口来看,都充满令人不安的不平等。今年,巴西每一所入围榜单的大学在研究质量方面都是连续第二年下降。

资助资金的减少不仅影响了QS的研究指标,也会影响其他一些指标。比如国际教师比率与学术声誉值。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个国家提供世界一流的教学和研究的能力取决于它吸引优秀学者和海外留学生的能力。二者相辅相成。

比如在英国脱欧之前,就已经有很多人指出,脱欧行为会潜在地影响留学生在英国作为留学目的地的意愿,而今年的排名也表明,英国对海外学者的吸引力正在下降。超过一半的英国大学在国际教员比例方面的分数出现下降——值得提醒的重要信息是,大部分用于排名的数据是在今年英国脱欧之前收集的。

在研究预算保持静态的情况下,我们很难预测英国大学今后在国际化方面的表现。学费方面的不确定性会影响学生,而学者方面的不确定性则来自于国内外资金来源的不确定。

在排行榜中,使用大学声誉这一指标是必不可少的。政府决策者、未来和现在的学生以及大学

的管理者,在了解全球学界当前的情绪方面都做得很好。到目前为止,QS的学术声誉调查是全球学术共同体最大的情感汇总。

欧洲学术界有一堆烦心事,西欧超过2/3的大学也看到了这一点。我们很难忽视以下这些因素之间的关联:日益增长的科研成果压力、被削减的预算、对看起来冷酷无情的高等教育市场化的恐惧,还有那种认为西欧大学会日益充满压力且对它们赖以生存的学生正在失去吸引力的观念。

(作者参与了QS世界大学排名审计与分析工作,韩理编译)

